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台湾◎李敖／著

李敖
文集
全集
39



中国艺术新研
中国迷信新研

李敖论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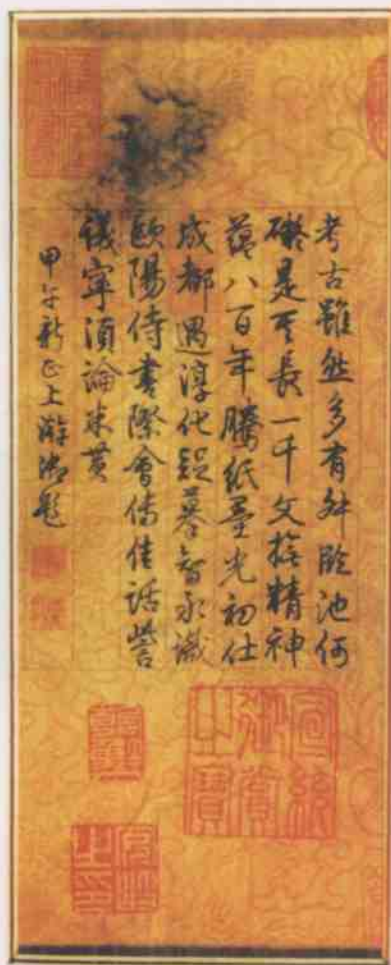
李敖论人物



李翰祥和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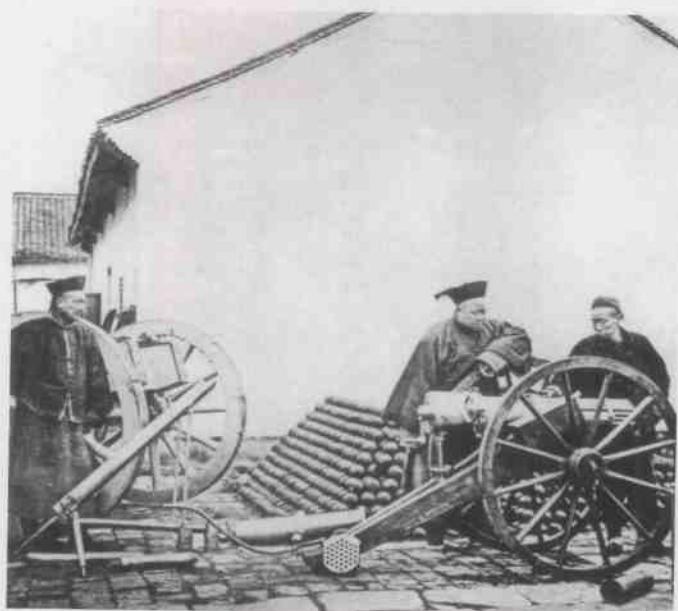
胡金銓和李放



考古難然多有舛脫池何
礎是長一千文粹精神
蕩八百年騰紙墨光初仕
咸都遇淳化段暮音永滋
歐陽侍養際會佳話嘗
鐵字須論來莫

甲午秋正上游湯魁

清代乾隆前隔水御詩



炮可灰乎

总 目 录

李敖论人物	(1—189)
中国艺术新研	(191—348)
中国迷信新研	(349—543)
附录	(544)



李敖论人物

目 录

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	(5)
我最难忘的五四人物	(28)
梁实秋逝世周年感忆	(31)
梁实秋的两篇重要佚文	(34)
方神父的惊人秘密	(49)
方神父的另一惊人秘密	(60)
海隅光销二十年	(63)
为殷海光先生出书经过	(66)
《雷震研究》前言	(75)
至今犹忆孙将军	(80)
《孙立人研究》前言	(83)
《孙案研究》前言	(87)
立法院最后一位强梁	(90)
哀胡赓年先生	(95)

杂谈李焕	(98)
与陈诚一席谈	(101)
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	(104)
小胡白描	(123)
哀江南	(124)
江南论李敖“蒙难”	(126)
对江南案李敖提出补充意见	(128)
王企祥该打!	(131)
黄三归来	(134)
我最难忘的一位“上将”	(137)
难友李世杰先生遗著序	(141)
刘辰旦——患难见真情的朋友	(146)
我看许信良	(171)
李庆华与生殖器政治	(176)
李庆华何必自苦	(180)
“苦苓之友”惜苦苓	(183)
为李锡崑教授新书写序	(186)

我最佩服的 一个国民党

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是一个死掉的国民党，他叫蔡元培。

蔡元培生在一八六七年，就是清朝同治六年。他在十七岁时当了秀才、二十三岁时当了举人、二十六岁时当了进士、二十八岁时当了翰林院编修。在旧社会里，这些纪录，是养尊处优功成名就的最好本钱，可是蔡元培却志不在此。他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抛弃旧的、迎接新的。三十五岁以后，他明显地转向革命，组织学社、编写报刊、制造炸弹，……样样都来。以一个出身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抛弃他拥有的最好本钱，不去做文学侍从之臣而去干革命党，这种奇变，真是绝无仅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曾在日记里记述蔡元培“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谁想得到这样一个旧社会的“隽才”，居然子宫外孕，脱生怪胎，要去搞革命！

搞革命，反对家天下

蔡元培搞革命，还在革命成功十多年前就开始，他组织中国教育会，成为早期的革命团体，又组织爱国学社，有《苏报》等宣传活动，被官方搜捕、迫害。又组织光复会，作为东南各省革命志士的大本营，后来与兴中会、华兴会三合一，变为同盟会，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主持国内革命业务。

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因为不满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决定辞职不干。蔡元培追忆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罪恶，可盖棺论定三点，第一是“官僚”，“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多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学究”，“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固也”；第三是“方士”，“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谏，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袁世凯这种毛病，早在没称帝前就被蔡元培看透了。蔡元培在武昌起义后，就做过这样的预言：“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事实发展，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在蔡元培眼中，既然这么不蔡又这么菜，蔡元培决心求去是必然的。一九一二年七月一号，袁世凯挽留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先生打消辞意。”蔡元培回得妙：“我也代表四万万人，向大总统辞职。”蔡元培辞掉教育总长，是他对“北洋军阀”第一次表现“不合作主义”^①。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号，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十二月二十六号，“北洋军阀”重新拉蔡元培回北京，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据国民党黄季陆回忆：

蔡先生被任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考虑是否接受此一任命时，曾遭受同志间的反对，不赞成其前往北京。关于此事，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廖仲恺先生曾对人说过，当时反对最烈的是马君武先生，而总理却赞成蔡先生去。证明中山先生真有眼光和气度，使蔡先生把革命的精神传播到北方。（《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

可见蔡元培就任这一职务，是有党的背景的。这一背景，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号，正式明显出来。这天蔡元培当选了国民党一全大会一届中央候补监委，据黄季陆回忆：

当中山先生念出蔡先生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时，会中立时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是说蔡先生是在北京政府的势力下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有依附军阀的嫌疑；一是批评蔡先生放纵青年学生思想左倾，仇孝非孔。一位思想偏激守旧的安徽代表张秋白并当场提出询问。中山先生报以微笑，并轻描淡写的说：“你对蔡子民同志有误会，此事非片言所能尽，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处置。”大会对于张秋白的意见并未予以重视，因此亦未发生什么影响。

我对于提名蔡先生为候补监察委员，内心感到十分的不安和怀疑。我的不安和怀疑倒并不是因为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误会他依附北方军阀和放纵青年左倾。

我以为蔡先生在革命的历史和他在学术思想上的贡献，要嘛，不提他的名；要提他的名，就不应该提名他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的邓泽如、谢持两先生，在学术界和青年人的眼光中都不及蔡先生出任监察委员恰当。我曾经以我的看法请教胡汉民、廖仲恺、戴传贤诸先生，他们的答复和我一样，对中山先生这一处置不甚明了。我和蔡先生并不熟识，他此时正在欧洲，并没有在广州出席大会，我之作如是看法，动机是于一个青年人纯真的好恶观念。有一次我很冒失的向中山先生提出我关于蔡先生出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的意见。中山先生很委婉的说：“蔡子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能到北京去工作。”（同上）

黄季陆的结论是：

蔡元培先生好似是预置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亦是北方革命的播种和耕耘者，在转移风气启迪民智上发挥了重大的革命功效。他的基本是北京大学，他爆炸出来的火花是新文化运动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的学生爱国运动。这是一次真正的文化的首都革命，影响及于此后的中国历史，是无与伦比的深远。（同上）

“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

其实，从历史上看，蔡元培在北京做为“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的作用，并不是“隐伏”的，而是公开的，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发表《洪水与猛兽》，主张疏导新思潮的洪水，驯伏“军阀的写照”——猛兽。这种公然的挑战，哪里还是“隐伏”的呢？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蔡元培知道在学生方面，“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但是“在校言校，为国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所以他辞职了。“北洋军阀”大总统徐世昌慰留他，“北洋军阀”教育总长打电报给他，说“学府主持，非公莫属”，同时派人南下，接他回北京。“北洋军阀”明明知道蔡元培是来自南方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但却如此对政敌优容，照今天的政治标准，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度量，“北洋军阀”如此对待政敌，真可教人比较、教人“往事只能回味”了！

这次辞职，形式上是学生肇事、校长引咎，骨子里却是蔡元培对“北洋军阀”第二次表现“不合作主义”，虽然当时在辞职启事里和文电里，他并没点破，直到三年以后，他才说出了真相：

《易经》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和平期成

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得这样快，唯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去北京，那时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智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袁项城一进京，清室就同‘摧枯拉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快到末日了，且看它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它还不肯开诚布公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候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动，当时的坏人，大抵是一无所能的居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时势的，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著一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等，替他文化事业上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当所以这班胥吏式的学者，只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就问他们：“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我那时候就缕述某君的话告诉大家，并且申说：“现在政府那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留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